

我身上有了“汉味”

□田中全

早在兰州大学求学时,武汉这个城市之名,于我已是如雷贯耳。我知道她曾经是抗日战争时的临时首都,于1954年又战胜了特大洪水。当我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人民出版社时,我的心是欢喜的。

1956年12月6日我抵达武汉,没两年,我就适应了这里的气候,也渐渐懂了点武汉人的脾性。

武汉人特别讲“礼行”,请他们帮忙,一定要讲礼貌,先来一套敬语:“您家,请……”我懂武汉人后,和他们交往,就未遇到令我难堪的事。我虽然不说“您家”,但总用敬称,或曰先生,或呼老板。比如在市区,忽遇阵雨,而又无伞,我会马上找到一家小杂货店的遮阳篷下站立避雨,并礼貌地对老板示意:“老板,我只是在这里避雨,一会儿就走,不影响你做生意吧?”谁知那老板说:“进来坐吧。”我喜出望外,道声“谢谢”,便坐在他递来的一把小竹椅上,和他聊起了家常。他听出了我的四川口音,便说:“你们四川人好。听先辈人讲,许多湖北人在抗战中跑到四川避难,四川人都很同情,让出多余的房间给我们住,绝口不提房租什么的……”

再说一件我和武汉人打交道的趣事。那是搬进武昌天源城小区,女婿为我们买的新房。大的家具都置办好了,就是还要添置一些小件用品,我和妻子去余家头家具一条街买。本着货比三家的规矩,来回比较,看中了一个中年妇女所卖的小茶几,钢化玻璃圆面板,支架架为进口藤皮包裹,做工精致。我和妻子去了她的小摊两三次,当我们走到小茶几前,向女店主打招呼时,她却不耐烦了:“一个百多块钱的东西,看来看去好几回了,烦不烦?”我知道她这种人是不给抬杠的,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,说:“你有钱啦!我们穷啦!”出乎我的意料,她叫道:“哥哥,莫这样说啦!我只是做小本生意的。”她还不依,继续说:“你还占我便宜。看样子你最多四十岁,我马上就七十了,你竟然叫我哥哥。”她一点也不恼,竟然和我拉起了家常,说她家有几个姐姐,一个大哥,她是老么。她的大哥年纪和价格不多。于是口角化于无形。我照她的价钱,买走了那个小茶几。

武汉市民有淳朴的古风。20世纪80年代,酷暑时节,武汉人吃晚饭时,先在自家房前街面上,泼上几桶水,驱散一些热气,然后摆上两三张竹床,拿出皮蛋拌豆腐或切开的咸鸭蛋、凉拌毛豆、绿豆汤,放在一张竹床上,一家老小围坐就餐,其乐融融,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吃完后,麻利地把碗筷一收,把竹床整干净。老人耐性,与街坊聊聊天,便带着小孩回房睡去。街窗密麻的床,不久大家就都睡熟了。一夜相安无事,反正我是没有听到过什么“揩油”之类的丑闻。

因为工作关系,我几乎跑遍了小半个湖北近三十个县市,对湖北比四川家乡还要熟悉。湖北的江汉平原,远比称为天府的川西平原要大,其物产之丰饶也不逊色。且盛产芝麻、棉花,这在我的家乡也是稀有的。记得岳母回川,总要带上几斤小麻油(川人称为香油)。还记得有一次我随副总编吕庆庚先生到江汉,他请我吃了一回名店现做的八宝粥,十分香糯可口。我们下乡访贫问苦,但当地干部说,现今这里没有多少贫困户了。有个个别孤寡老人,则列入“五保户”。大队妇女主任把我们带到五个保户家,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大娘。她听我们是省里来的干部,十分高兴。她说自己衣食无忧,还指着身边的大黄狗说,还有这个宝贝,三五天就去处处茅草丛中,给我叼回一只野兔,我每天都有肉吃呢。

公安县也是相对地广人稀,我为帮助一个作者商讨改稿事宜,曾在他家住了一天,那是公安县城远郊,是一大片丘陵地区,家家居住差不多都一样:门口一个水塘,大门后有一个院子,然后是宽敞的住房好几间。屋后是一片松林,大约有几十棵之多。作者岳母为我们准备了顿丰盛的晚餐,主菜是两道:红烧鲢鱼、红烧甲鱼,都是野生的。我来到湖北后从未吃过的美味。晚上睡得很香。早上被屋后松林中的鸟儿的啾啾声叫醒,十分惬意。

我慢慢爱上武汉人,湖北人,爱上湖北这个好地方了。并渐渐喜欢上了鄂菜,特别是早点,如热干面、肉窝、糯米包油条、豆皮、糊汤米酒……湖北还是个体育强省,如象棋、羽毛球、跳水、体操、网球等,都出了拿过冠军的名人,如李义庭、柳大华、汪洋、洪智、田秉义、吉星鹏、韩爱萍、周继红、伏明霞、李小双等。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:“楚地多才,又能兼容四方俊彦”,这样的例子很多,就拿我接触较多的武汉大学,华中师范大学而论,其中的知名教授,就有不少是湖南人、安徽人、广东人、江西人。大名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另外,我还发现,武汉人的火爆脾气也渐渐变了。不仅是与时俱进的老武汉人,更多的是新武汉人,因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,举止文明,语气温和,而且乐于帮助年轻人迈体弱者。关于新武汉人的乐于帮助者,我有亲身体会,受到他们帮助的情况很多,兹举三例。大约2006年左右,我乘公交车回天源城,在车家岭站下车时,遇到大雨,因未带伞,一年轻女士见状,使用伞遮住我同行,告知我住在天源城后,便坚持把我送到所住门栋前,才离去。连声道谢后,我并没有马上开门进去,而是看着她的身影,直到她从天源城的小道出去,我才知道她并不同住天源城,而是弯道送我,怕我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淋雨生病。2024年,我89岁,办事中,要下一个坎子上天桥,但无可抓扶之处,正为难时,一中年男子路过,便停下脚步,说:老人家,我来扶你。说罢便伸出右手,让我紧握,安全地下了坎子。前几天,我从外面办事回家,因所携东西较多,十多分钟顾不上口,后面的一个女士见状,便拿过我的口罩,帮我戴口罩,并把侧门打开,侧身让我先进上电梯的过道。

想到这些,我的心暖暖的。我早已完全融入荆楚大地,融入武汉人群,并且身上也有了“汉味”。

烟雨嘉兴

□梁鸿鹰



南湖烟雨楼(国画)

钱松岳作

梁鸿鹰:曾用名梁红鹰,笔名文羽。现任《文艺报》总编辑,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,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。

敬畏和感悟

□梁鸿鹰

嘉兴南湖不仅发生过开天辟地的大事件,也有沈钧儒、褚辅成、汪胡楨、朱生豪等先贤留下的精神印记。踏上这片土地,在浙沥春雨中,南湖的红船、烟雨楼、梅湾街等承载历史记忆的景致扑面而来。而雨“滋养万物,润物无声”的特质,烟雨南湖的精神感召,先贤精神对后人的影响,恰可作为探寻嘉兴文脉传承与爱国精神内核的一个意象。深入历史长河,方可与先贤灵魂对话,我希望以自己的文字,反映对嘉兴这片土地孕育的精神财富的敬畏和感悟。写作过程中,我始终在思考如何让历史人物与当下读者产生共鸣。沈钧儒强调青年要读书、实践、修身,朱生豪主张文学反映时代、作用于人生,这些理念穿越

时空,为当代的人们提供着启示。文中引用的诗句、日记片段,都是为了让人物更鲜活可感。如沈钧儒狱中日记对行云飞鸟的观察,朱生豪心中对门前景象的描述,这些细节让杰出人物变得亲切,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普通人并无二致,却在关键时刻展现出超越常人的格局。沈钧儒的“坚”与“善”,朱生豪的“痴”与“勇”,共同构成了嘉兴这片土地上动人的精神图谱,他们的品格正如南湖的雨,看似轻柔,却具有滋养坚韧生命的力量,先贤们的精神,必将在岁月流转中,不断浸润着后人的心灵,让更多人感受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潮中的家国情怀与文化担当,这正是此文写作的初衷。

一个我在”,把整个身心全部浸入到书里面去;倡导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在旅途中调查风俗,接触民众,体察疾苦,增加对现实社会认识,获得真切学问。我流连在沈钧儒纪念馆,那“坐看云起时”的假山石,形似太湖石的“鸡骨石”等,让我印象深刻。据说喜欢石头是朱家七代的传承。沈钧儒选石、赏石、藏石,将自己的一个书房命名为“与石居”,并以“吾生尤好石,谓是取其坚”自勉。于右任、李济深、郭沫若等均与“与石居”题词,冯玉祥这样题词:“南方石,北方石,东方石,西方石,各处之石,咸集于此。都是经过风吹日晒,雪侵雨蚀,可是个个顽强,无亏其质。今得先生与石为友,点头相视,如旧相识;且互相祝告,为求国家之独立自由,我们要硬到底,方能赶走日本强盗。”沈钧儒与这些大家经常在这里相聚,赏石励志,以石喻人,同气相求。沈钧儒一生的刚正清廉,恰与石头形成了一种完美的互证关系。

二

近代以来欧风美雨,西学东渐,民智开启,经典普及,端赖翻译。而说到现代翻译,嘉兴人朱生豪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。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,几乎没有书店、有学校、有图书馆的地方就有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。此次来到嘉兴,我两次前往朱生豪故居,缅怀这位翻译大家。朱生豪故居地南湖湖区文荟萃之地梅湾街,距离水利专家汪胡楨故居、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避难处不远,位于嘉兴南湖湖区禾兴南路73号(原南大街东米棚下14号),为一座二层小楼,门口矗立着朱生豪、宋清如雕像,故居一层按时间轴对朱生豪、宋清如生平的生辰辰致致动人,让人感慨,在故居后院,是小小的草坪、一间灶房、餐厅,沿狭窄的楼梯上到二层,是复原了的朱生豪夫妇旧时卧房和书房。桌床椅凳,书柜衣橱,睹物思人,让人唏嘘。这个位置地处梅湾街,梅湾因梅而得名。相传明万历年间,此地曾植梅筑园,故有此街名,又说因街形曲折如梅枝而得名,是嘉兴南部乡镇进入嘉兴城的必经之路。这座朱生豪的出生地和故居,朱生豪一生停留的时间并不多。他在1935年4月30日在写给宋清如的信中这样描述门前景象:“……街道前有一条小河,常见上城下下的船只、桑叶船;去南湖的游船,载着着色的大柚船,也有脚踏船,每天早上便有人喊叫开船了,到朔望烧香或迎神赛会期间,门前拥挤不堪,连店堂里也挤满了人。”可见他对这里印象之深。

朱生豪原名朱文森,生于浙江嘉兴一个没落商人家庭。朱家之前靠经营为生,一度曾颇具规模,但是到了朱生豪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,所经营的布店、油酱店和小型裱厂连

续亏空,家境不再殷实。朱生豪是朱家盼了许久才盼来的男丁。5岁那年入读嘉兴南门梅湾街的明初小,9岁时以甲等第一名考入嘉兴县立第一高级小学,平时住在丈大妈家,周末和节假日与家人团聚,饱览家中藏书《聊斋志异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山海经图说》《唐诗三百首》等,汲取了丰富营养,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朱生豪10岁时,体弱多病的母亲撒手人寰,过了没几年,在他12岁时父亲又去世。他由舅居的大妈抚养,另外两个弟弟寄养或过继别家。由于幼年失去怙恃,尝尽生活辛酸,导致朱生豪性格孤僻、沉默寡言。在姑妈帮助下,他插班到秀州中学,正式改名叫朱生豪。在这里,朱生豪的各门成绩,尤其是中文和英文取得长足进步。对《新中华国语》与《复兴初国文》《中国文学小史》《四部备要》,以及英文《新中华》《标准英语阅读》《准确英语》等的学习,进一步打牢了他的中英文基础,兰姆姐弟的《莎士比亚故事》,以及《哈姆雷特》《裘力斯·凯撒》等原著,使他对莎士比亚产生强烈兴趣,拜伦、雪莱、济慈、华兹华斯、白朗宁、斯温伯恩等也进入他视野,为他打开了新天地。

就是这样一个人,1929年高中毕业时成绩优异,特别是英文好,诗作得好,为一致公认,但他身体瘦弱,体育成绩不佳,加之家境苦寒,眼看就要错过上大学的机会,开明的校长黄式金想尽各种办法,将朱生豪保送到杭州之江大学深造,且得到全额奖学金。朱生豪在之江大学主修中国文学,兼攻英语,他不负众望,学业品行很快让他脱颖而出。对这位总考第一的学生,亦师亦友之之江大学国文系讲师、词学大家夏承焘评价甚高,他在《天风阁学词日记》中多次表达对朱生豪的赞赏,比如在1931年6月8日的日记这样写道:“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,多前人未发之论,爽利无比。聪明才力,在余师友间,不当以学生视之。其人今年才二十岁,渊默如处子,轻易不发言。闻英文甚深,之江办学数十年,恐无此不易之才也。”朱生豪学业优异,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,而是有着心怀天下的志向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朱生豪曾担任校“抗日救国会”文书股负责人,积极参与反日活动。

朱生豪大学四年级时遇到了出身书香门第、很有个性的宋清如。他俩因诗结缘,经常鱼雁传情,以诗会友,互诉衷肠。因国文和英文成绩优异,任英文编辑。1935年的上海文化出版界掀起了一个翻译热潮,这与鲁迅先生应约对国民党“文化围剿”,提倡“拿来主义”不无关系。鲁迅不仅身体力行翻译果戈理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等外国作家的作品,还写了三篇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,希望林语堂翻译莎士比亚,未果。朱生豪所在上海世界书局决定翻译出版莎士比亚全集,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滢慧眼识珠,推荐他担此重任,朱生豪欣然应允。当时日